

# 近年来《三国演义》研究中

## 的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川省社科院和四川省社联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三国演义〉研究》专栏，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一九八三年四月，在成都举行了全国首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研究。现将近年来争论比较多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 一、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多年来，学术界公认《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成书于元末明初。但近年来又提出了以下几种看法：

个别同志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根据书中在关羽死后被赠予“义勇武安王”的称号某些版本对关索故事的叙述以及书中某些地名的注释这样三个材料，认为《三国演义》不是明代的小说，而很可能是南宋或北宋乃至唐五代的作品，因此该书的作者究竟是谁，也就成了悬案。对于这种观点，绝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

一些同志认为，罗贯中是宋末元初人，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元代。主要根据是：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有一篇《门人祭宝峰先生文》，门人名单中有“罗本”认为这个“罗本”就是罗贯中。也有的同志进一步推论，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大约完成于至正元年（1341年）到十一年（1351年）之间，即在罗贯中四十岁至五十岁的时候。

另一些同志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但成书时间应是明初，理由是：《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中的罗本是罗贯中，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列入门人名单的三十一人是按年龄长幼的顺序排列的，罗本处于第十一位，而处在第八位的乌斯道生于1314年，处于十三位的王桓生于1319年以前，这就可以推算出罗本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也可相应订为1385——1388年。罗贯中成书的年龄约在五十岁左右，而在他处于这个年龄的时候正是明初。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不是罗贯中，成书时间应是明代中叶。理由是：文学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总是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由粗浅到精密这样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是这样，它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元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刻印于至治年间（1321—1323年），它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但全书只有八万字左右，文笔也还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约有八十余

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它的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至于把该书作者说成是罗贯中，那很可能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书的身价而假托的该书真正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

##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

除了过去提出的“忠义”说、“正统”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等主题思想外，近年来还提出了以下五种看法：

1. “天下归一”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这种观点认为，《三国演义》通过汉末至西晋初的农民起义，诸侯割据、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描绘，表现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中生乱，乱归于治”的历史辩证法，反映了“天下归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诚然，这种“天下归一”是归于封建阶级的统一，但它在当时条件下是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有的同志提出“分合”说，这种观点与“天下归一”说比较相近。

2. “歌颂封建贤才”说。这种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主要是歌颂封建贤才的。书中的主人公之一“诸葛亮，是一个“志”、“德”、“才”三者齐备的封建贤士：当隐士时，有治山治水、躬耕陇亩之才；当军师时，有运筹帷幄、克敌制胜之才；当丞相时，有立法施度、治国理民之才；他还懂天文，知地理，具有创造之才。作者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采用多种艺术手法，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封建贤士的形象，满腔激情地加以歌颂赞美，同时还塑造了一批文武贤才的形象。整部《三国演义》，就是一曲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

3. “悲剧”说。这种观点认为，曹操集团与刘备集团的对立斗争，构成了《三国演义》一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而在《三国演义》中所表现的刘备蜀汉集团的失败，则是在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个历史悲剧。

4. “仁政”说。这种观点认为，贯穿于《三国演义》的强烈的“尊刘抑曹”倾向，反映了挣扎在封建制度残酷压迫之下的人民对于仁政的歌颂和向往，对于暴政的批判和鞭挞。这不仅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而且是它在思想倾向上的民主性、进步性的表现。

有的同志还提出“歌颂明君贤相”说，这种观点与“仁政”说比较接近。

5. “治军用兵原则”说。有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的主线是战争，它的主人公是曹操、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军事家，书中的政治事件只是作为战争史的“过门”来写的，《演义》中发挥了最强烈的社会效果的是战争谋略。因此，对《演义》的主题应该从军事角度来认识，其主题的主体部分是宣扬“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

##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

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三国演义》主要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我国自周秦以来，民间文艺的艺术风格都以浪漫主义为主，多用艺术夸张的手法。评话艺术尤其离不开夸张的手法，因为它的特点就在于夸张。《三国演义》脱胎于评话艺术，从评话和戏曲中吸取了夸张手法，所以，夸张就成了它的基调。

另一种意见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使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首先,它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表现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局限于“正史”,而更多地依据了作者的全部历史知识,因此,全书的人物和事件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其次,作者还创造性地运用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丰富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细节描写。第三、作者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加强了对历史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从而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四、关于“毛本”《三国演义》

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演义》,是三百多年来唯一通行的《三国演义》版本,其影响之大,可以同金圣叹评改的《水浒传》比肩而立。怎样评价毛本的功过得失,主要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毛纶父子的评改本改得好,没有他们的精心修改,《三国演义》在艺术上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高的水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毛纶父子也参加了《三国演义》的创作。毛纶父子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在语言方面,对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罗本”)进行了大量的、精心的修改,改正了许多不通顺的句子,改正了重复、不合逻辑之言,修改了上下文不相衔接之处,删改了冗长拖沓的文辞,使《演义》的语言更加整洁、流畅。第二,在情节方面,对“罗本”作了改、增、删,使全书的情节更加合理生动,人物性格更加鲜明。第三,在人物形象的润饰方面,“毛本”在忠于“罗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统一。

另一种意见认为,毛纶父子对“罗本”的修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改错,整个说来是失败的。“毛本”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导,以“蜀汉正统”为褒贬人物、论定是非的唯一标准,凭着自己感情的驱使,任意拔高或贬低小说中的人物,这是“捧杀”与“骂杀”,不是真正的艺术。第二,有意篡改“罗本”原有的一些词语,加之不明元人语汇,这样不仅往往改错,而且使得原作语言的时代特色也就不复存在了。第三,对“罗本”中不少出于史传的历史事实任意篡改,损伤了原书的历史真实性。因而,毛纶父子的不少修改是对罗贯中的亵渎。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对于《三国演义》应该进行新的校勘整理,只有由此入手,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上。

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本”功过相兼,得失参半:“整顿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分析其结构特点,是评改之所得;而将小说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的‘正统观’夸大为作者的基本创作思想,以取代作者的创作思想‘忠义’说,则是其评改之所失。”具体说来,“毛本”将“罗本”的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合并为一百二十回,使《三国演义》的长篇结构趋于定型化,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格调。同时,毛氏父子还独到地分析了《演义》的层次安排、线索设置、情节组合、情节剪裁、情节插叙、动态和静态交替描写等六个结构特点,这是对长篇小说在布局总构上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毛氏父子的这些见解,同金圣叹对《水浒》人物的艺术分析一样,对古典小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但是,“毛本”从封建“正统论”出发,将“罗本”已有的尊刘抑曹的倾向推上了绝对化的道路,企图把艺术变成图解“正统论”的工具,宰割小说内在的艺术联系,这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沈伯俊)